

後來哈伯馬斯與伽達默的爭論，以及德里達與伽達默諸人的爭論等等。這種方式是康德那個時代不可想像的。哲學家不光要會寫(大部頭)書，而更要緊的是要會想問題，談問題，討論問題。哲學家從「製作」(大部頭)、「著作」(書、體系)的框框中解脫出來，會是甚麼樣子，古代雖有典範在，但仍要看下一個世紀的實際情形了。不管怎樣，寫書也好，寫文章也好，對話、討論也好，哲學的存在方式是變化了、擴大了、豐富了，參加的人，也一定會更多起來。

未來的情形不可能預測得很詳細。二十一世紀哲學的情形，要看現在的青年人對哲學問題怎樣想、怎樣做。但到底會是甚麼樣子，我們不可能、不必要、也不應該「看得」很清楚。為甚麼？因為，要這樣，只有要他們完完全全地按照我們規定的路子走，才能非常清楚地「預測」到下一個世紀會是個甚麼樣子。而這是不可能的。就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對於下一代的事，只要看出一個大概就很好。而這個「大概」是很確定的：下一代肯定比我們這一代更好。那些「更好」的因素，就在「現在」的年青人的身上。我們對於「未來」不可能有十分確切的知識，但卻可以有十分堅實的信念。

葉秀山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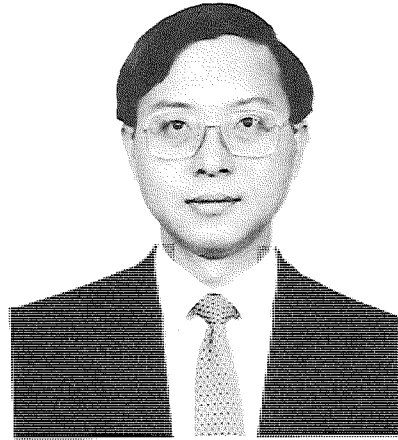
## 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 歷史意義

廖柏偉

近年來不少學者及評論者都稱譽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成就為經濟上的奇跡。若果單從經濟成就的層面來看，這個奇跡並不算獨一無二。戰後德、日兩國的經濟重建也可算是奇跡之一。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意義之深遠在於他們揭示了一條發展路向，而這條道路是一般第三世界國家都可以遵循的。

在四小龍於70年代年經濟起飛，引起世人注目之前，世界上經濟發達的國家除了日本外，都是歐美或是白種人的國家(如澳、紐)。這些國家，除了少數細小的歐洲國家和由白種人殖民開發的國家如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外，都有一段不光榮的帝國主義歷史。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和帝國主義和

殖民主義沾上關係，因此在經濟發展學說中，一直以來都有一派學說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必須通過侵略及掠奪殖民地的資源來進行資本積累。這條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顯然不是一般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可以採納的，餘下來的選擇就只有通過社會主義發展經濟了。這派學說最激進的代表自然是馬、列主義者。除了馬、列主義者，6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中的新左派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



雖然沒有採用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的分析，但也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大國通過跨國公司控制第三世界國家如拉美國家的經濟命脈，實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

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的重大歷史意義，在於說明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不必然通過帝國主義完成。恰恰相反，四小龍都曾經是或現在仍然是殖民地，都曾經遭受西方、日本列強侵略。而四小龍的發展策略在不同程度上都開放本地經濟，歡迎外國投資者「掠奪」本土資源，然而四小龍今天已成為新興工業國家(地區)，並且在不久的將來，必可趕上先進工業國家(地區)的行列。

四小龍經濟發展的成功因素，已有不少學者研究，最主要離不開尊重私有產權，推行市場經濟，開放貿易，減少政府管制等，這裏不贅述。我主要指出一點，四小龍沒有侵略別國，也沒有掠奪他人資源，按上述學說，他們是侵略及掠奪的受害者，但他們都成功地以資本主義方式發展了經濟，從而否定了這派學說，並揭示了一條既不需侵略掠奪別國，也不需施行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四小龍發展的歷史意義是否重大，主要決定於他們的經驗是否通用於眾多的落後第三世界國家。反過來說，四小龍是否具備一些獨特條件令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容易模仿？首先四小龍都是天然資源短缺，人口相對眾多的國家(地區)，不少第三世界國家也具備這條件。其次，四小龍及緊隨其後開始經濟起飛的第五小龍泰國及第六小龍馬來西亞，文化背景差異很大，有受儒家影響的，有信奉佛教及回教的，所以一個國家不需要具備特別的文化背景，才可促進經濟起飛。

四小龍是當代資本主義成功發展的範例，但是第三世界國家通過社會主義發展成功的例子卻付之闕如，因此四小龍經驗的影響更為明顯。最近東歐政局劇變，差不多每個國家的人民都要求進行步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其中背後或多或少亦受亞洲四個小國(地區)的成功經驗影響。

最後值得一提的一點是四小龍的發展經濟是否只適用於外向型的小國經濟，不適用於億萬人口的大國？在這裏不打算作深入的理論分析，只指出一點值得大家思考的，泰國人口五千多萬，人口上算得上是不多不少的中等國家了，它走的正是四小龍的路，現在可算是第五條小龍了。此外印尼人口一億多萬，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國，經濟亦已經開始起飛，這是一條大龍，印尼跟隨的

也是四小龍的路。如果今後十年印尼經濟發展也比上四小龍70及80年代的成就的話，則四小龍的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對人口大國也適用。可以說龍不在其大小，只要是會起飛的龍便行了。

廖柏偉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主任

# 根在苗先

## ——中國如何進入二十一世紀

赫希萊弗(J. Hirschleifer)在1977年4月號的《法律與經濟學刊》(*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發表了〈從生物學觀點看經濟學〉的論文，標誌着生物經濟學的興起。但這並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認同的經濟學：佛利民(M. Friedman)說，他不需要以遺傳學說來解釋至高無上的自由市場經濟運作；森姆遜(P. Samuelson)針對貝加(G. Becker)的有關分析，指出這是「芝加哥生物學」而不是著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時至今日，生物經濟學已有長足發展，但不讓其「認祖譜宗」的經濟學家仍大有人在。今年春夏季號的《憲制政治經濟學報》(*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有一篇書評，對羅斯德(M. Rothschild)的新書《生物經濟學——資本主義之必然性》(*Bionomics - The Inevitability of Capitalism*)批評得體無完膚。書評作者，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窩內爾

